

新民主主义政权 理论的演进

张光宇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前　　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是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发展的。它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方案失败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日臻成熟而不断地发展，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胜利四个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是与其政权的实践紧密结合的。自党成立至大革命前期，党尚无政权实践活动，当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自大革命后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政权理论的探索是与政权的实践结合进行的，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促使政权理论的形成发展，在正确的政权理论指导下，又不断完善政权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又是在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理论、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长期的比较和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它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理论、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的破产。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发展的直接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下列论断是正确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唯一正确的过渡性的国家形式”（《新民主主义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归宿,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这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是马列主义政权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宝库。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解决了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在政权上的交替问题,使新民主主义政权和平地顺利地过渡为社会主义政权,这是史无前列的创举。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书就是根据上述构思进行编写的。

本书是集体讨论提纲、分工执笔撰写的。各章执笔人分别为:第一章、二章—宋俭;第三章—彭敦文;第四章—钟永恒;第五章—薛毅。全书由张光宇修改、定稿。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一些同志的研究成果,并得到武汉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并致以谢意。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谨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周年!

编者

1991 年 4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方案的探索和失败	1
第一节 从改良到革命	1
一、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改良设想	1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体改良构想及实施的失败	11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建国理论与实践	24
第二节 理想的破灭	29
一、昙花一现的“民主共和制”	29
二、挽救民主共和制的最后努力	35
三、形形色色的建国设想	44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萌芽	58
第一节 艰难的起步	58
一、从“劳农专政”到“真正民主共和国”	58
二、共产党人对新型民主政权理论的初步探讨	73
三、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雏形	90
四、由“在野党”到“参政党”的转变	101
五、探索中的严重失误	114
第二节 探索中的实践	120
一、肩负政权职能的工会和农会	120
二、初具新民主主义因素的武汉国民政府	124
三、第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地方政权	132
四、“八一”起义中的革命委员会	141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形成	143

第一节 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小资产阶级的政权理论	143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	143	
二、国民党五院制政权的建立	149	
三、第三党的“平民政权”理论	158	
四、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与失败	166	
第二节 苏维埃运动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171	
一、“八七”会议关于建立政权的构想	171	
二、苏维埃政权模式的提出及其理论依据	175	
三、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82	
四、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192	
第三节 走出苏维埃模式	206	
一、“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民主力量对全国政权的新要求	206	
二、中国共产党的“国防政府”主张	213	
三、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思想的发展	219	
四、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共和国”方案	223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成熟	229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的中国政权	229	
一、国民党的战时党政体制	229	
二、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	235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系统化	243	
一、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理论	243	
二、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理论的批判	247	
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	250	
四、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设	258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努力	272	
一、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	272	
二、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联合政府”主张与国民党的谈判	279	
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290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胜利	296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各党派的建国方案	296
一、国共两党关于国体与政体的激烈争论	296
二、“中间路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	307
第二节 两个政权的搏斗	313
一、从“制宪国大”到“行宪国大”	313
二、“中间路线”政治幻想的最后破灭	316
三、解放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319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	326
一、建立各大解放区统一的人民政权	326
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覆亡	331
三、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新决议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332
四、新政协的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339
五、历史的经验	344

第一章 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 方案的探索和失败

1840年的鸦片战争翻开了中国历史最屈辱的一章，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英国人的大炮也使得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在西方列强野蛮的炮舰的背后，其实是西方新兴的近代工业文明对东方落后的古老农业文明的挑战。随着鸦片和各种外国商品从洞开的国门涌入，西方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政治学说也传了进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的潮流，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受到剧烈冲击，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们带着对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绝望和厌弃，憧憬着西方生机勃勃的近代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制度，开始探索以西人为师、变革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道路。

第一节 从改良到革命

一、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改良设想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日之将夕”的昏暗局面使得一些关心国事的有识之士已敏锐地预感到了封建社会末世的到来，开始意识到必须变革现存的社会秩序，发出了“自古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今，法无不变更，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的要求变革的呼声。^①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找到社会改革的蹊径，因而，更多的是对封建专制弊病的揭露和批判，而不能提出一整套社会改革计划，设计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来取代那已经腐朽了的封建专制制度。

鸦片战争失败后，战败的耻辱和深重民族危机极大地刺激了一部分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使他们意识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明的存在，驱使他们认真、冷静地了解和研究世界大势。于是，他们不仅看到了西方人“坚船利炮”器物文化的优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开始有了粗略的认识。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鲜明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一口号中包含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要求学习西方、变革社会秩序的政治主张。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不难看出，所谓“夷长技”并不仅仅指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也包括了更高层次的制度文化，魏源在这部百卷本的著作中，不仅分析和比较了中国在军事、制造工业等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同时也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和优劣，并表示出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向往，他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度，尤其对美国和瑞士的民主共和制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称颂，认为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②可见，魏源所主张的“师夷长技”除了公开提倡的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外，在更深的层次里，隐含了要师承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之长技”的要求，只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还不能够公开表达出来，因而未能引起世人的注意。与魏源同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了解、研究西方的时候，都普遍地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共和制政治创立的历史、州长、总统

①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19 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海国图志》百卷本附。

的选举法、任期规定及议会制度、程序等等，并对“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开启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先河的华盛顿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称首哉！”^① 梁廷枏的《合省国说》是一部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亦重点介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并流露出对这种“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② 的民主政体由衷的倾慕。但是，他们和魏源一样只是表露出对这种政治制度的向往和朦胧追求，还不能够明确地提出要效法这种民主政体的政治主张。因此，尽管魏源们已经开始留心研究和传播西方的制度文化，但这一时期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主要的仍停留在表层的器物文化阶段。

1859年，也就是《海国图志》问世后第17年，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负责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具有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资政新编》，在这份充满生机的条陈里，洪仁玕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再停留在对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欣羡和赞叹上，而是大胆地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方略，《资政新编》的主题就是大规模地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在提出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具体措施的同时，洪仁玕以明显高出同时代人的眼界，注意到了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他颇费心机地向天王介绍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③ 尤其对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充满了赞誉之辞：“花旗邦即米利坚，礼义富足，以其为最。……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

①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② 梁廷枏：《合省国说》，《海国四说》第1页。

③ 洪仁玕：《资政新篇》，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11月出版，第30页。

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① 尽管洪仁玕在这份条陈里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取法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但他显然是以其为蓝本，提出了一系列改造和重建太平天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如立法制，去酷刑，设新闻馆，兴邮政，办学校，办医院等等，这些措施都充满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色彩，尤其是“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使“上下情通”的主张，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倡设议院的先声。

几乎同时，冯桂芬也提出了与洪仁玕几乎一致的政治改良思想。冯桂芬于 1860—1861 年间写成了著名的《校邠庐抗议》，在这份文献里，他和洪仁玕一样，对于美国“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柜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的民主选举制度极为推崇，认为正是由于实行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制度使得美国富强，“其势骎骎凌俄英法之上”^②。进而，他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在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各方面全面改革的必要，指出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技不如人，即使在内政制度方面也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③。其中“君民不隔”一条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根本不同之处，并大胆地断言中国的制度“不如”西方的制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冯桂芬还惊世骇俗地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主张^④。在这篇文献里，他实际上表达了这样

① 洪仁玕：《资政新篇》，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 1959 年 11 月出版，第 35 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手稿转引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1 页。

③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第 9 页。

④ 冯桂芬：《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卷上，第 23 页。

一种观点：既然在政治体制上西方也有比中国优越的地方，那也应当向西方学习，建立一种能使“君民不隔”的民主制度。令人遗憾的是，冯桂芬没有能在这种激进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变革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涉及到具体的改革方案时，他的立场便后退了一大步。为了实现“君民不隔”，冯桂芬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通俗说来，就是评核选擢官员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以百姓的“公论”作为评核官员的依据；设置一种由下层百姓选举产生、有任期限制并由选民监督的乡官，负责处理民间诉讼，并通“上下之情”；允许并鼓励人民用诗歌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或反映苦情，言者无罪，从而使下情上达，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联系。这些措施，离冯桂芬所推崇的美国民选制度、议会制度显然还相距甚远，也还谈不上带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性质，远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尽管如此，冯桂芬的这些主张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编》相呼应，毕竟给当时人们那朦胧的社会改革要求付与了切实、具体的内容，而且，他们这些主张都十分强调重视下层民众的呼声，鼓励人们自由发表政治意见，并尝试在社会底层移植西方的民选制度。这些实际上已隐含了对近代西方民选制、议会制和言论自由的朦胧期盼。

洪仁玕的《资政新编》和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包含的政治改良思想由于大大超过了当时思想界和一般人们的水平，因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但这种思想却直接成为八九十年代改良派变法思想的“前驱先路”。以洪仁玕、冯桂芬为代表，表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已由表层的器物文化阶段开始进入以研究、学习西方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文化阶段。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开展了一场以挽救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以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尽管洋务派力图使这一运动完全局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轨道上，但洋务运动的开展，客观上却进

一步促进了“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在西方的洋枪洋炮和技术设备大量涌进中国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政治学说也通过各个渠道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在办洋务中，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时，“西学东渐”的主流已不是西方的工艺技术，而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而 70 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又为这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应当指出的是，早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弱小，他们虽然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和要求参政的愿望，但从其产生到其政治力量的正式集结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在此之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政治、经济主张的是一部分从封建地主阶级阵营中分化出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以郑观应、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刺激下，迫切地感到变革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必要，开始酝酿并提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设想，他们在比较了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和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后，明确提出了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主张，并初步提出了以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政治，让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的政治改良设想，从而把洪仁玕、冯桂芬等提出的朦胧的政体改良要求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 70 年代中后期，郑观应、王韬先后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意见。郑观应在大约成于 1875 年前后的《易言·论议政》中公开主张“仿行泰西之法”——就是要学习西方的议会制度，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稍后，王韬也提出了同一政治主张；他在题为《重民》的文章里，在比较了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政体的利弊和区别后，认为“君民共主”的制度最好，他总结这种政体的特点是：凡国家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

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进而认为“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① 是一种理想的政体，因此，王韬极力主张要在中国建立这样一种“君民共主”的制度，他指出：“试观泰西各国，凡其强盛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② 很显然，在这里，王韬是把实行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度当作谋求中国富强的根本出路。

到 80 年代中，中法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初呈败象以后，郑观应、王韬的这种君主立宪的要求在进步思想界便很普遍地提了出来，几乎所有的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如陈炽、陈虬、汤寿潜、宋育仁、何启、胡礼垣、宋恕等都不同程度地阐述了设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和具体办法，如宋恕提出了“三始一始”的理论：“欲化满汉文武之城，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水火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改革封建政治体制的具体纲领，“更官制，设议员，改试令”三款均是指对封建上层建筑的改造。而“易西服”（服饰革命）一说则是仿效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试图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学习西方、讲求西学的气氛，以更新人们的观念，统一思想，减少变法的阻力，这表明宋恕的认识超出同时代人之处，在主张政治体制改良的同时，他已经注意到了对人们文化心理和社会观念的改造。宋恕断言：“中国能大开上下议院，自宰相督抚以至州县，咸由公举，行之十年，则十

① 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 22—23 页。

② 王韬：《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第 68 页。

③ 宋恕：《上合肥傅相书》，《万国公报》第 10 册。

八省必可进至倭人未变法以前局势；行之四十年，必可进至日本今日局势，可决也。”^①陈虬在提出了《创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后，又开具了创设议院的具体设想，他认为西方的议院制度“其制繁重”，中国猝难仿行，应变通其法，如地方议院的设置可“令各直省札饬州县，一例创设议院。可即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利害，不取文理。议式附下：为承议某某事，窃以为其利益有几，其弊害有几，实系害多利少，似难举行。□□年月日某都某处某某谨议”。^②凡地方大事，均须集议而行，地方官要临议院，与地方父老周咨详细，互相驳辩，“议定而后行”。^③这样，改良派知识分子便由对开设议院的一般议论和对西方议会制政治的单纯倾慕发展到了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具体设计阶级。1893年底，郑观应写成了《盛世危言》，甲午战争后，又几经修订，在这本书里，郑观应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改良设计。他认为，议院制度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御侮救国的良方，同时，也是根绝专制独裁的保证：“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如欲富国强兵，“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④激烈地要求在中国立即实行议院制，他呼吁，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都有明显的成效，在中国“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可亟行哉？噫！慎矣！”^⑤这种态度较之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更为激进。以设立议院为中心，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内政改革措施，主要如：广办日报，以舆论监督行政；“凡献替之谋，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

① 孙宝鑑：《忘山庐日记》（上），第243页。

② 陈虬：《救时要议·开议院》，《治平通议》卷5，第11页。

③ 陈虬：《东游条议·创议院以通下情》，《治平通议》卷6，第4页。

④ ⑤ 郑观应：《议院》，《盛世危言》卷1，第19—21页。

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①从而发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的作用；官吏和议员必须“公举”，废除封建制度传统的以“保举之法”选拔官吏和“易地服官”的制度，“法之善者莫如公举”；^②采取“限仕”和“汰冗”的政策，精简行政机构，规定“督抚以年七十为度，赐金趣休；司道以下亲民之吏，则当以六十五为限。及限不告退者，则请罢之”。^③国家各级政府机关“设官分职”，应“使各有所职，……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复何取乎多人？”“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唆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因此，必须裁汰这种“幸位之流，素餐之辈”。^④等等。郑观应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措施，在中国建立起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治制度，应当说，他的这些主张是切合时宜的，并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色彩。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观应的这些正确主张是不可能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的。同一时期的何启、胡礼垣又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了郑观应的政治改良方案，在1894年问世的《新政论议》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封建政治体制的措施，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是“开议院以布公平”，即是要在社会公正、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建立议院制民主政治，并具体设计了开设议院、选举议员的方案，要点如下：第一，地方议院的设置和权限。县、府、省三级各设议会，每级六十名，规定任期，凡“兴革之事”，政府均应交议会讨论通过，如“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第二，中央议院的设置和权限。中央议院由“各省议员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院议事”，议定之事，奏闻天子，由天子“御笔书名，以为奉行之据”。第三，议员的选举程序和方法。

① 郑观应：《日报》，《盛世危言》卷1，第33页。

② 郑观应：《公举》，《盛世危言》卷5，第14页。

③ 郑观应：《限仕》，《盛世危言》卷14，第10页。

④ 郑观应：《汰冗》，《盛世危言》卷14，第14页。

各级议员分别由平民在秀才中，秀才在举人中、举人在进士中选举产生，“凡男子二十岁以上，除喑哑盲聋以及残废者外，其人能读书明理者，则予以公举之权”。第四，突出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新政立，则商贾中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①与这种制度上的政治改良方案相配合，何启、胡礼垣同时还在思想文化上大力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民权思想和社会契约学说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公开提出“天下之权，唯民是主”，“自主之权，赋予于天”，“天子之权，得诸庶民”等观点，^②强调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天子及各级官吏的权力均来自庶民，民可立之亦可废之，人民不仅有选举权，亦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从而，将这一时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改良设想系统化、理论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概括而言，这一时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改良构想是试图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中的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们尤其重视议院的设立，几乎每一位改良派知识分子都充满激情地介绍和赞扬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度，并一致主张把这种制度引进中国，他们均将议院视为反映民意、体现民权、维护“公平”、沟通君民、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象征，因此，他们就议院的设立设计了种种可行方案，呼吁“亟行议院”。同时，还围绕设议院这一中心，猛烈抨击了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僵化、腐朽和反动，提出了改革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措施，诸如“更官制”、“改试令”、“易西服”、“公举官吏”、广办日报、“限仕”、“汰冗”等等，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改良方案。

这一时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改良构想基本上是以英国式的议会制君主立宪政治或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为蓝本的，如何启、胡礼垣等的主张倾向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而王韬、宋恕等

① 以上引文均见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

② 何启、胡礼垣：《〈劝学编〉书后》，《新政真诠》五编。

的主张则更近似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并非不向往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们认为那种体制暂时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企图在保留清王朝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进行有限的政治改良，从而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样一种方案显然更切实可行一些。这正反映了早期改良派的基本政治立场。

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循着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思路，痛感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急切呼吁变法图强，实行新政，并且冀图借助皇权的力量将其政治改良构想付诸于实现。于是，以变革旧的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变法维新运动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体改良构想及实施的失败

1895 年春，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 1300 多人联名上书皇帝，反对签订和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维新救国纲领。这次上书，标志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从而，也揭开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序幕。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和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使素以“忧国忧民忧天下”为己任的改良派知识分子痛切地感到，再不立即变革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这种危机感和急迫感使他们不再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阶段，而立即行动起来，要将他们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行。但是，由于阶级和